



英语语系的博物馆学研究综述*

Anglophone Museum Studies: An Overview of the Field

莱安农·梅森¹ 著 夏宁梓² 译

Rhiannon Mason¹ Translated by Xia Ningzi²

(1.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 纽卡斯尔, NE1 7RU; 2.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71)

(1. Newcastle University, Newcastle, NE1 7RU;

2.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为博物馆学领域以英语著成的研究提供综述, 并介绍构建该领域框架的重要议题与作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英语语系的博物馆学已发展成国际公认的跨学科学术研究领域。该领域融合了来自艺术史、文化地理学、民族志、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 同时也涉及文化政策、经济学、观众研究与旅游等领域。博物馆学的多样性一方面构成重要的学科优势, 另一方面也为入门者带来挑战。随着时代发展, 去殖民化的博物馆与文化遗产的形成过程近年来亦成为该领域的重要议题。

关键词: 博物馆学 跨学科 去殖民化 文化政策 遗产研究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n overview of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anglophone museology, introducing key discussions and authors that frame the discipline. Since the 1990s, anglophone museology has grown into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interdisciplinary academic field. It integrates theories from multiple disciplines such as art history, cultural geography, ethnography, and history, while also encompassing areas like cultural policy, economics, visitor studies, and tourism. The diversity within museology is both a significant strength of the field and a challenge for newcomers. In recent years, the decolonization of Eurocentric museums and heritage history has also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Museology; interdisciplinarity; decolonization; cultural policy; heritage studies

* 本文是对收录博物馆研究领域重要文章的五卷本文集《博物馆学研究综述》(*General Introduction to Museum Studies*) 中初版时两篇英文导读的重新编撰。建议读者参考全书以获取更多详细信息。MASON R.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museum studies. Vols. 1-5.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语语系的博物馆学已发展成国际公认的高度跨学科的学术研究领域。它借鉴了艺术史、民族志、文化地理学、文化研究、历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同时还涵盖了文化政策以及经济学、商业、市场营销、访客研究和旅游等其他领域。这种学术上的多样性是该领域的巨大优势，但也使初学者难以入门，尤其是当学术作品发表在不同学科门类的期刊和丛书中时。即使是熟悉某些领域的人，也可能对其他学科同时期的重要讨论一无所知。鉴于该领域的这一特点，建议那些希望了解其范围的人从阅读汇集重要文献的论文集开始^[1-5]。当然，博物馆研究和遗产研究除了英文之外还有其他语种的重要学术成果。近来，该领域的重要发展之一是重新强调以欧洲为中心的博物馆和遗产历史去殖民化的重要性。

一、什么是博物馆研究？

博物馆自成立以来一直是探究和讨论的对象。藏品管理者以及建立博物馆的政府或个人都以各种方式对博物馆的宗旨、观众、适当的展示方式和所有权等问题进行过反思。正如盖尔·安德森（Gail Anderson）于2004年出版的《重塑博物馆》（*Reinventing the Museum*）一书中明确指出，至少从20世纪初的美国，以及我想补充的19世纪的英国^[6]开始，博物馆行业内部就存在着丰富的内部反思和自我质疑传统。例如，她指出美国某一博物馆馆长约翰·科顿·达纳（John Cotton Dana）在1917年出版的“新博物馆丛书（*The New Museum Series*）”中写道，“鼓励博物馆领导者向更广泛的社区传达信息，并研究接触更广泛公众的新方法，包括消除关于谁应该从博物馆受益的排他性态度”^[7]。这些观点在当代与博物馆有关的辩论中同样适用。

在博物馆研究成为一门学科之前，其渊源可追溯至19世纪末的英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8]。不过在

英国，博物馆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6年英国莱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eicester）第一个博物馆学系的成立。该系的成立确定了英国的博物馆研究领域，并在国内外的研究和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其他大学，如我所在的英国纽卡斯尔大学，都开设了博物馆学的研究生教学与研究体系；其中许多课程进一步扩展到“画廊研究”“策展”，以及最近的“遗产研究”领域。与此同时，艺术史、历史和考古学等相关学科也在其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中增加了以遗产、博物馆或艺术画廊为重点的课程模块。例如，考古学学生可以选修遗产管理课程模块，美术学学生可以选修当代艺术策展模块，历史学学生可以学习与遗产和博物馆研究颇有共同之处的公共史学。

在其他英语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博物馆研究在学术界也已颇有建树。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学会发挥着枢纽作用，在其网站上汇总了博物馆学科的信息，并详细介绍了全球所有主要的研究生课程。

在实践中，大多数国家都开展博物馆研究和教学，尽管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事实上，只要浏览一下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遗产研究课程目录，就会发现非洲、亚洲、中东、欧洲、美洲，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地区，还有，中国最近也开设了博物馆和遗产研究课程。通常，博物馆研究与旅游、保护、历史或艺术保护、文化政策、遗产研究、创意和文化产业以及文化遗产管理等领域并驾齐驱，上述是迄今为止与博物馆研究并列的最常见的领域。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有两个国家在大学教育规模方面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第一个是英国，第二个是美国^②。

因此，到目前为止，许多国家的学生和学者经常从英国和北美的英语文献中寻找灵感。与此同时，虽然跨国对话自然是任何学术讨论的一部分，但也必须认识到跨文化的政治、文化和政策环境下

① 感谢克里斯·怀特海德（Chris Whitehead）提醒我注意到这一观点和资料。

② 相关信息参见<https://www.criticalheritagestudies.org.post-graduate-courses>。



对文献的解读存在局限。假设一种文化背景下对博物馆的理解与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完全一致，这是很危险的。与此相关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英语国家的博物馆和遗产历史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构建的，直到最近，才充分认识到欧洲博物馆和遗产史一直是欧洲殖民主义者，通常是通过剥削，与其他社会文化接触的历史^[9-10]。

二、实践中的趋同和分歧

之所以能够发现不同国家的博物馆间的某些共性，并且在不同地区的博物馆研究和实践中找到相似之处，有几个原因。例如，卡罗尔·斯科特（Carol Scott）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①国家的公共部门越来越多地受到绩效管理技术、治理原则和以经济可量化的方式证明公共资金合理性的压力的影响；所有这些特征都与有时被称为“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的现象有关。这种现象并非完全一致，也并非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发生。例如，2015年的数据显示，美国公共部门支出的GDP占比不足37.9%，英国约为42.2%，而法国（56.8%）和芬兰（57.0%）等国家则要高得多。这些国家资金中有多少用于博物馆建设也有很大差异^②。

尽管存在差异，但关键在于，这些公共部门博物馆的管理和评估方式近年来无疑发生了变化。许多不同国家的博物馆工作人员现在可能都会感到，地方、地区和国家政府在管理博物馆和改变博物馆优先级方面更加积极。在许多国家，由公共财政资助的博物馆现在更有可能由资助者设定其应当达成的目标。而且，许多主要民主国家的政府及其公务员越来越试图通过量化“产出”和“成果”，使其资助的公共服务更加“负责”，这与新公共管理的实践相一致。因此，即使博物馆的实际目标和受众

不同，其管理和治理方式也越来越相似^[11]。

虽然斯科特认为某些政府对博物馆等公共机构日益干预的做法并非没有受到质疑，但这确实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不同地区的国家采用了相似的新公共管理方式，并因此引发了关于博物馆在政府政策议程中的作用的相同讨论。这些管理框架反过来又产生了共同的制度逻辑，这些逻辑以与其他较旧的组织因素（如民族主义、民主和公民权概念）一样强大的方式塑造了博物馆专业人员的实践和优先权。可以说，这种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文化供给模式也与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和安东尼·麦克格雷（Anthony McGrew）等作者讨论的全球化加速所带来的同质化但却多变的影响是一致的^[12]。

三、相似性是如何造成的

许多欧洲博物馆具有共性和相似性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都植根于相似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语境中，为“博物馆应该是什么”和“博物馆应该做什么”的理念的发展提供了背景。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在许多欧洲国家，国家与公共博物馆之间的关系与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所称的“公共领域”平行发展，随着国家公民、政治代表、普及公共教育和自由民主观念的变化而发展起来^[13]。这些概念同时受认识论发展的影响，即我们如何理解某些知识领域；这种发展通常为政治目的服务并使其合法化，如帮助欧洲在世界各地殖民扩张合法化^[14]。

如今，许多国家的人都很熟悉博物馆，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将其存在视为理所当然，并认为博物馆一直都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然而，决定保存物品并按照各种科学或美学组织原则将其排列成藏品的行为是一种具有自身历史和逻辑的社会实践。为什么社会要选择投入宝贵的资源来永久保存文物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博物馆研究学者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个人、国家和社会开始收藏周围世界物

①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立于1961年，截至撰写本文时拥有36个成员国。

② OECD 2015年政府支出数据，见<https://data.oecd.org/gga/general-government-spending.htm>于2017年发布。



品的动机和原因有很多，不同学科的学者对此提出了各自的分析观点^[5]。这些收藏史帮助我们了解世界上许多最知名博物馆是如何形成的。这些历史对于我们理解博物馆作为知识生产者，及其如何在构建、塑造社会对知识和世界的理解中发挥关键作用也至关重要。在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的眼中，组织规则似乎很自然，但这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最初构建藏品结构的原则；因为我们现代的分类实践是随后来的知识范式而产生的。一旦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不仅会认识到博物馆是知识生产者，它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也反映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而且这些知识范式会随着时间和文化的不同而变化。

因此，欧洲公共资助博物馆的后续发展和英国等国的收藏实践需要与考古学、人种学、人类学、生物学、自然历史、艺术等知识体系的发展和传播，以及民俗等其他领域的发展一并看待。正如最近的调查所表明的那样，知识体系、分类学和分类法与权力、政府和政治问题息息相关。事实上，从这些收藏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公共博物馆一直与更广泛的政府议程紧密相关。这些议程包括教育民众、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教化”工人阶级、培养集体认同感、在国际舞台上提高国家地位，以及在许多情况下为殖民化的种族逻辑提供道德和经济依据^[15]。

将博物馆理解为“政府性”的一部分已成为博物馆研究文献的一个关键特征，托尼·本尼特关于展览综合体^[16]的著作就是一个典例。在许多方面，这些对早期收藏的详细研究以及关于博物馆目标的争论为后来探索权力和政府性的主题奠定了基础，而这些主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主导着英语写作中的博物馆研究。这些详细描述收藏实践的重要原因是，它们揭示了欧洲博物馆形成的历史决定性因素之一是探索和殖民。在早期的研究中，这一因素更多地被当成研究的背景，但后来却逐渐突出。事实上，对博物馆自身历史的研究已成为博物馆所处当代政治地位的一个决定性特征。虽然凯文·麦肯齐（Kevin Mackenzie）和安妮·E. 库姆斯（Annie E. Coombes）等作家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开

始关注博物馆的殖民和后殖民历史，但直到最近，这些问题才成为英国和其他英语国家博物馆研究和博物馆行业的主流。在当前背景下，这被称为去殖民化^[10]，并与当前学术和实践的另一个主要领域：博物馆行动主义相关^[17]。

四、公共博物馆的概念

上文讨论的早期藏品与当今博物馆收藏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藏品的获取途径以及谁有权参观这些藏品。在16和17世纪的欧洲国家（如英国），大多数是私人收藏，观众的阶层受到严格限制^[5]。

这种情况在18和19世纪发生了变化，许多欧洲国家也发生了同样的转变。这种广泛转变是由于政府和精英逐渐认识到博物馆藏品和展览的教育职能：有助于管理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当时这被理解为“文明化进程”，后来又被理解为国家建设。同时，正如戴维·詹姆斯·邓肯（David James Duncan）等作者所言，我们必须谨慎，不要将当代对“社会”、“国家”、“公众”或“公民”的理解投射到这些描述中，因为这些概念的理解比现在要狭隘得多。

然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英法等国家的公共博物馆的概念是在18和19世纪奠定了基础。博物馆“免费开放”，博物馆“为国家服务”，博物馆是公共领域的一部分，以及博物馆具有社会目的等理念都源于这一阶段。本尼特1988年发表的文章《博物馆与人》（*Museum and 'The People'*）与这段历史有关，他对社会学和批判理论，尤其是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巴特和福柯的作品的研究，为博物馆研究的英语写作开辟了新的方向。事实上，本尼特1995年出版的《博物馆的诞生：历史、理论与政治》（*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一书明确以法国哲学家福柯1975年的经典著作《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为出发点。本尼特在《博物馆与人》中提到，其他许多作者已经在展览和收藏文化的研究方面作出宝贵



的贡献，而自己的贡献在于将所有这些汇总起来，并将博物馆的概念置于其研究的核心，肯定其“在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赋予其真正的严肃性。本尼特提出的“展览综合体”概念描述了“一套旨在组织自愿自我调节的公民的文化技术”^[18]。因此，来自各学科的更多学者被吸引到博物馆研究中，激发了关于博物馆、治理和权力的辩论，这场辩论一直持续到今天^[16]。过去政府希望通过部署“公共文化”来管理民众，这一点对于理解当今的公共博物馆，理解今天的博物馆收藏与早期藏品的根本区别至关重要，早期藏品只在非常有限的社交圈内，供私人消费。与对国内人民的控制及对海外殖民地人民的征服相呼应，本尼特的文章阐述了博物馆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本尼特和苏珊·阿什利（Susan Ashley）也探讨了公共博物馆的含义，他们都采用了更现代的框架。在他们的文章中，对“公共”一词提出了质疑，并对博物馆是否能够、是否确实履行了自己许下的承诺提出了疑问。本尼特特别借鉴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指出成为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就是能够“决定和解决对公众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19]。他探讨了博物馆是否可能以其他方式运作，并告诫不要不加批判地理解与博物馆有关的公共性理念。最后，本尼特提出了一个更福柯式的理念：如果博物馆的运营是“与公众竞争和对抗”的过程，那么“博物馆是否应该成为解决辩论和冲突的权威声音，还是应该促进不同公众之间的辩论”？阿什利探讨了同样的问题，她问道，当代加拿大博物馆能否重新认识自己的角色，重新定义自己的传统权威基础，并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转变为“提供权威意见的众多机构之一”。在此过程中，阿什利还广泛借鉴了公共性理论，并作出了有益的区分。她得出结论：“博物馆不仅需要专注于作为文化权威的代表和举办展览——‘在公共场合’行事，还可以充当集会场所或社区中心——‘代表公众’行事。”^[20]总之，所有这些著作都提出了基本问题：谁拥有公共博物馆，它为谁服务？

公共博物馆为公众服务这一基本理念对理解英国博物馆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的基础

是国家与受资助的文化机构（如公共博物馆）相分离的原则。这一原则被称为“独立交易原则”，鲁思·布兰迪纳·M. 奎因（Ruth-Blandina M. Quinn）对此进行了如下描述。独立交易原则基于这样的理念：艺术理事会存在和运作应相对独立。人们认为，政治对理事会活动的影响应保持在最低限度^[21]。

这一原则对于巩固英国公共资助博物馆的地位至关重要，这意味着公众和博物馆专业人士普遍认为博物馆应具有公共服务精神，并像英国广播公司（BBC）一样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不受当时政府的控制。虽然“独立交易原则”仍然是英国博物馆部门治理结构的基础，但在实践中，博物馆永远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政府或完全自主。博物馆使用公共资金，带来了对其的要求、监管措施和期望：博物馆将帮助实现资助机构的优先事项，而这些优先事项又来自资助博物馆的政府部门^[22]。这里的关键点是如何理解“政治”一词的概念和范围。英国博物馆在原则上和宪法上都是“非政治性的”，不受当今政府的直接干预、影响和控制。同时，如果以更广泛的意义来理解“政治”，即主流群体的利益和价值观如何通过某些世界观和实践的合法化而得到再生产和推广，那么博物馆无疑是始终具有政治性的^[23]。

五、博物馆与当代政治

秉承这一政治概念，值得考虑的是世界不同地区的博物馆可能面临类似挑战的其他结构性原因。在欧洲，尤其历史类博物馆不得不面对近期移民模式的影响：无论是真实的人口迁徙还是对“移民”这一概念的想象。“移民”不是统一的概念，也不仅仅发生在当代。人类的历史可以看作是多次大规模移民的历史。欧洲国家的殖民权力建立在向外“移民”的基础上，同时在国内和世界其他地方获得廉价劳动力。在现代史上，许多国家为积累财富，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在等级制度下，这些成本主要由阶级、种族和性别底层的人承担。作为欧洲现代性的关键机构，博物馆无疑是欧洲殖民主



义所“创造”财富的储存库和受益者^[5]。不出所料，英国和西欧的许多博物馆必须对历史殖民主义遗产的当代影响做出具体回应，包括归还他国文物的要求、关于其收藏人类遗骸的争论以及当代移民模式对英国和西欧社会的影响^[24-25]。

在这些争论中，博物馆肩负着巨大的责任。它们必须承担风险，塑造值得讲述的故事，并真正解释现代世界的复杂性。在大众传播或国家教育普及之前，公共博物馆往往是人们在熟悉的环境中接触新思想的唯一场所——人们可以在那里了解周围环境以外的世界，了解他们已有观念以外的世界。在英国，公共博物馆的发展早于1870年全民教育的普及，因此博物馆是成人和儿童接受公共教育和知识的主要来源，否则他们将无缘接受正规教育。在21世纪，问题几乎正好相反。网上有大量的“信息”，但人们慢慢开始意识到，其中的大部分都非常不可靠。博物馆独特的权威地位建立在公众对其世代相传的信任之上。这种信任是脆弱的，必须不断重新赢得；然而博物馆不能也不应该回避争议或在争议中从不表明立场。

在许多社会中，博物馆已经发展成为最重要的场所。在这里，各族群以官方认可的方式讲述自己的身份和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是谁，“我们”排除了谁，“他们”又是谁。至少在欧洲，由于博物馆的发展方式，它们通常将参观者视为公民。在这种背景下，博物馆不可避免地成为群体身份争议的焦点。当人类学家所说的“内群体”和“外群体”之间的界限受到挑战或双方都感到威胁时，对群体身份的焦虑就会加剧。在某些国家，人们认为移民数量增加，或认为移民本身具有某种威胁，这种观点导致公众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两极分化。如果将博物馆视为国家如何讲述自身故事的资料库，如果博物馆体现了“我们”的概念，将其实例化，展示给所有人；那么就不难想象，博物馆是如何成为高度政治化场所的。鉴于2010年至2020年的十年间，许多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出现了右翼、极右翼和本土主义民族主义的复苏，这一点变得越来越重要。

长期以来，不同派别的政治家一直致力于控

制博物馆如何讲述某些故事的权力；过去十年，左派和右派、本土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之间的较量尤为激烈^[5]。与此同时，博物馆工作人员越来越认识到，他们和他们的前辈并不垄断道德权威，甚至不一定垄断知识或真理本身^[26]。不同群体可能创造和认可不同形式的知识，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终于得到了认可。此外，如果我们接受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及其同事的研究结果，或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葛兰西关于特定群体对国家机构施加“霸权”的激进见解，我们就很难认为博物馆一直都是公正、中立的研究场所^[27]。

近几十年来，人们对来源不同、政治根源不同的知识和真理的权威地位提出了普遍质疑，博物馆也因此成为被质疑的中心。在哲学和概念方面，来自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等理论运动的批判，以及博物馆研究者对自身的批判通常是左倾的。在政治行动主义方面，包括原住民和社区团体，各种不同的行动者都对博物馆的传统权威提出了挑战，他们质疑博物馆的历史和实践是霸权的、片面的，体现了既得利益者的价值观^[17]。这些质疑往往集中在博物馆历史和实践的特定方面——例如，遣返送回、归还文物和非法贸易等问题。最近，许多欧洲国家的民粹主义和右翼批评增长惊人，这些批评的支持者声称自己是“精英主义的、保守的、提倡多元文化的”。此外，有些人，如宣扬神创论者，以宗教为由攻击博物馆的科学性和实证性。上述越来越多的对博物馆传统哲学和认识论基础的质疑，导致学者、政治家和媒体观察员关于这些主题的文献也随之增多。

六、作为学科的博物馆研究

英国学者彼得·弗格于1989年撰文称博物馆学是一门相对较新的学科。与许多作者一样，弗格指出，20世纪80年代是学术界对博物馆产生浓厚兴趣的时期，他创造了“新博物馆学”一词来描述这一运动。有一系列篇幅更长、地域范围更广的著作也可算作新博物馆学，即使这些作品没有使用新博物



馆学这一名词。这些著作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①。“新博物馆学”不同流派共同点是，它们都对关于博物馆及其目的的传统观念提出质疑。正如弗格所说，人们“普遍对‘旧博物馆学’感到不满……‘旧博物馆学’的问题在于过多地关注博物馆方法，而很少关注博物馆在社会中的作用”^[28]。迪尔德丽·斯塔姆（Deidre Stam）将新博物馆学的批判置于更长的时间框架内，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并试图从众多作者的著作中提炼共同的核心关注点^[29]。

斯塔姆指出，当前的批评之所以有别于之前的批评，并更具说服力，是因为它与更广泛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外部挑战不谋而合。与斯科特一样，斯塔姆指出，在英国等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通过提高对资金价值的期望、增加博物馆支持政府议题的目标以及在博物馆管理和治理中采用新的公共管理方法等方式，不断向公共资助的博物馆施加压力。与此同时，博物馆在争夺人们的闲暇时间方面也面临着更大的竞争，人们期待博物馆的观众更加多元，观众群体进一步扩大，也期待他们的购买力更强。正如斯塔姆所说：“通常用‘危机’这个词来描述当今博物馆的状况。”^[29]来自资助者、社区、艺术家和活动家的外部挑战，与学术界的批评以及博物馆专业人员自身对其实践的批判性反思相结合，这使得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新博物馆学的辩论更加迫切，也使人们对这一领域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七、谁在撰写博物馆？

斯塔姆的观察凸显了英语博物馆研究的不同寻常之处，即核心辩论通常由从业人员和学术界人士共同参与，而且这两个职业之间存在交流。该领

域的许多作者都担任过博物馆馆长和大学研究员，甚至同时兼任两种职务，尽管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因此，要充分理解博物馆研究，需要关注许多不同类型的文献和出版物。我们需要认识到，这门学科是来自不同视角的参与者之间的对话，且有些人同时拥有多重视角。我认为，认识到参与者的多重视角，这一英语研究领域的特点尤为重要；而这有时会被初学者忽视。在这方面，要充分理解博物馆研究，读者需要纵观不同类型的出版物，评估目标受众，并密切关注作者的履历和机构立场。

除博物馆馆长对博物馆的评价外，还有许多其他人也在评论博物馆。例如，由于博物馆的高知名度、公众地位以及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等问题对广大公众具有重要意义，政治家往往很快加入到围绕博物馆的公开辩论和争议中^[4]。这是博物馆从古至今的永恒主题。不难理解，博物馆因其公共资金来源而受到政策制定者和资助者的监管和关注。这导致大量重要的博物馆资料出现在资助协议和非学术的官方出版物，如报告、政府文件和政策文件中。这类资料历史悠久、内容丰富，通常保存在机构或政府档案中，例如19世纪的议会辩论、委员会和政府工作报告。

八、博物馆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因此，博物馆研究人员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面对博物馆的复杂性。我们应该如何构建研究框架以提供新的见解，同时承认理解博物馆本质的其他方式也是成立的？一如既往，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构成了研究的适当分析单元。

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下面将概述博物馆研究领域，通过文献中最常见的研究问题和方法对其进行分类（表1）。列表绝不是详尽无遗的，而旨在

① 译者注：国际新博物馆学联盟（*Movement Internationale pour la Nouvelle Muséologie*, MINOM），隶属于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联盟成立于1985年，总部位于葡萄牙里斯本，此前于1984年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了一次会议，有来自不少于15个国家的博物馆学家参加。MINOM的理念可以追溯到1972年在智利ICOM会议上通过的《圣地亚哥宣言》。这次会议为博物馆制定了一套新的指导原则，并强调博物馆需要参与当代社会问题。

表1 博物院的探究领域与研究方法

探究领域	重点	分析单元	相关概念与方法
博物馆体验	了解在博物馆空间中的游客体验	特定分众或人口统计——如年轻人、儿童、老人、传统或非传统游客、散客、团体游客等，以及关注如何将“参观”以及体验融入个人或社群的历史中	身份、学习、情感、情绪、动机、福祉、健康、社会性、习惯、文化资本
博物馆与社会	了解博物馆是一种社会现象，以及博物馆如何影响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	与单个博物馆或博物馆群相关的广泛社会趋势和社会对它们的关注点——例如，某一博物馆可被视为了解国家发展的关键，如果它是国家博物馆，则可能是唯一相关的例子；也可以对侧重于以社会历史、移民或人权等为主题的 国家或国际博物馆网络进行调查，并将其与有关这些主题的公众争议联系起来	民族主义、公共领域、民主、纪念、文化资本、社会/文化排斥、社区凝聚力、移民、社会正义、公民培养、数字媒体、社会行动主义
博物馆与认识论	了解博物馆如何受特定时期社会认识论框架（以及其中政治因素）的影响，同时也要了解博物馆本身如何生产、授权和赋予知识特权；博物馆如何具有政治性并对物品、空间和人产生影响	机构，物，藏品：包含其征集、管理、流传的历史、相关政策等，展览，规划，实践，机构分工，藏品与展览档案的分类、编目等	知识建构的过程和实践、学科发展、典籍形成、跨学科的方法、知识政治、分类学、隐藏的历史、父权制、殖民化、去殖民化、社会建构主义、关系网络、本体论框架、数字媒体
博物馆历史	了解博物馆（以及博物馆类型/流派）是如何发展的，以及当前实践如何受历史的影响；将博物馆理解为更广泛的历史和政治背景的一部分，例如帝国或欧洲民族主义的历史	博物馆个体或团体，创始人，赞助人，捐赠人，关于创建博物馆的辩论，藏品遗赠，建立和创建机构之前的行为——“奠基时刻”	物品传记、机构历史、个人传记历史、如何将博物馆及其历史定位为更广泛的社会变迁：例如本尼特的展览情结、文化治理理论、公共领域理论、国家历史理论
博物馆技术与实践	了解博物馆实践的发展历程；什么是以改进专业实践为目标的“最佳实践”	专业行为、运营实践和技巧：设计、展示、讲解、管理、观众评估、受众开发、营销、品牌推广、数字媒体	理论性较弱，更多侧重于实用指南和“如何做”的方法，依靠案例研究和小故事来示范建议，并以商业研究、市场营销和公关研究为依据
博物馆的陈述与争议	了解博物馆的陈述如何产生，以及如何与更广泛的社会关注和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博物馆争议如何表征更广泛的社会分歧和关注	单件物品，收藏品，机构，临时展览的组织与实践：如接受赞助、参与审查等	社会学、艺术史、文化研究、文化政治、女权主义、表征理论（尤其是围绕社会身份和受保护特征）、伦理辩论、博物馆史



续表

探究领域	重点	分析单元	相关概念与方法
博物馆行为和制度条件	了解博物馆作为机构和组织的运作方式和成因，以及这如何为特定的行为、逻辑、价值观和实践创造条件；博物馆作为特定机构，如何与其他机构共享某些特征和条件，以及如何使这些机构与众不同	案例研究：某一机构或团体，有时专注于单一主题的一系列博物馆（如通过参观英国的泰特美术馆来了解艺术理念的构建，或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国家博物馆来分析国家认同）或对某一类型博物馆的比较研究（如军事历史博物馆通常部分地由武装部队运营并为武装部队服务）	制度和组织理论、实践社区、组合理论、历史方法、文化经济学

提供指示性而非权威性。它体现了我个人认为英语文献中最重要的趋势和轨迹。

九、博物馆研究的路径

上述7大探究领域是否有共同点？尽管研究博物馆的方法多种多样，但实事求是地讲，“个案研究”一直是整个学科的主要方法论。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和里程碑式研究都是基于某一案例的研究，而不是比较研究^[30]。虽然这种单一方法对艺术史学家或文学理论家来说并不陌生，但在社会科学领域，这种方法却不那么受欢迎，因为在这一领域，多重案例研究更容易被认为提供了可推广的结论；并围绕该领域产生抽象的理论，而不是被视为仅仅是“经验主义”的方法。然而，由于博物馆的多元性和非同一性（没有两个博物馆是完全相同的），我认为个案研究方法的单一性确实有效，尤其是考虑到这种特定类型的博物馆可能只有一个实例。

大多数城镇只有一个聚焦于某一主题的博物馆，附近的其他博物馆通常会将藏品委托给这一机构。就国家博物馆而言，通常只有一家。即使是在许多博物馆中都能找到的常见藏品，例如，每个社会历史类博物馆中随处可见的家居用品，它们仍然与某个地方以及拥有或使用过这些藏品的个人有着特定的联系。就艺术博物馆而言，每件艺术品通常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意味着没有两家艺术博物馆是

完全相同的，即使可能具有许多共同的属性和特征，甚至可能展示的是同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并不像那些更习惯于使用大型数据集和概括方法的学者有时所想象的那样，博物馆作为研究对象的独特性是这一领域的弱点，而恰恰是这种独特性使其具有深入研究的可能。

与此同时，从关系的角度理解单个博物馆也至关重要，这不仅体现在与其他博物馆的比较上，也体现在与其他实践的总体比较上。例如，如果想了解一个国家博物馆如何促进特定社会中国家认同的官方描述的产生和传播，可能需要研究该博物馆与国家教育课程、国家纪念和庆祝活动的场所和实践以及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4, 31-32]。

再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考虑观众与博物馆的关系并使用文化消费的框架，我们可能希望将博物馆与人们的个人文化习惯（如购物、看电影和看电视）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对个人进行访谈，并在广泛的人口和地理范围中讨论博物馆和其他休闲活动的共同模式，以及人们对它们的基本态度^[33]。越来越多的研究采用比较方法，尤其是那些由欧盟委员会等主要国际计划资助的研究。

十、分析层次和单位

思考如何研究博物馆的一种方法是采用传统的社会学方法，即根据影响和重要性的大小或范围，



使用等级和分层来区分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层次和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对单个展览的分析通常是一种微观方法，对代表特定社区群体的博物馆的机构案例研究是一种中观方法，而从博物馆对整个国家的代表性角度对一个或多个博物馆进行研究则属于宏观层面的分析。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在分析上区分不同规模的活动和影响的方法。然而，在现有的英语博物馆研究文献中，这种方法很少被明确用作分析框架，当然，就博物馆分析而言，很难想象人们会如何严格区分各个层次。

这种等级分明、层次分明的方法也受到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的直接挑战，该理论最著名的提出者是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34]。行动者网络理论反对使用先验的分类方法，如国家或阶级，也反对微观—中观—宏观尺度的概念。相反，拉图尔主张一种网络化方法，即分析应考虑“行动者（人类、个人或非人类、非个人主体）”，并应从网络和节点，以及联系的强弱方面进行思考，而不是从实体的空间或层次大小方面进行思考。行动者网络理论源于科技领域，拉图尔认为：“如果不承认现代社会具有纤维状、线状、丝状、绳状、多孔状、毛细管状的特征，就无法对其进行描述，而这些特征是层次、层级、地域、范围、类别、结构、系统等概念所无法捕捉到的。”^[34]

行动者网络理论非常适合解释博物馆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尤其有助于思考博物馆的物质性。例如，如果要分析一个博物馆展览，我们需要意识到：设计和布局方面的决策会受到诸如残疾人通道需求或可用展柜大小等因素的影响，同样也会受到策展人对女权主义或殖民主义等概念性问题的看法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参与者和行动者网络中分布的“代理权”思想尤为有用。

本尼特指出，最近从人类学、考古学和组合理论等角度对博物馆进行思考的“知识取向”是“博物馆是一系列分散网络和关系的交汇点，这些网络和关系流入并塑造了博物馆的实践”。本尼特的结

论颇具启发性，他认为：“博物馆本身不再是一个可能的分析对象……相反，现在思考博物馆和与博物馆一起思考时，最关注的问题是博物馆的存在和作用，二者分散在与之相连的集合体中。”^[18]早期的博物馆研究，尤其是博物馆史研究，是从创始者和机构传记的角度来撰写的。相反，近些年的博物馆学术研究试图讨论博物馆藏品在历史上是如何通过贸易、发现和殖民主义网络等多种方式获得的，例如在民族志博物馆和考古博物馆以及艺术博物馆中，征服或讲述国际艺术史的愿望意味着追求从世界各地收购藏品——这种思维方式正是博物馆研究发生转变的最显著特征。

体现这种新思想的一种方法是“物品传记”^[35]或微观历史，它跟踪一件物品从进入博物馆，有时又通过退出馆藏而离开博物馆的过程。这种网络化的微观史学方法具有一定的方法论优势，尤其是考虑到博物馆藏品规模可能非常庞大而难以研究。例如，大英博物馆有800万件藏品可供选择；然而，如果要研究其中的一组标签，并将它们与权力问题联系起来，那么采用文学研究中的文本方法或借鉴文化研究与传播研究中的批判性话语分析方法可能更有意义。同样，对国家博物馆的研究仍然倾向于大量借鉴历史、地理和政治学科发展相关的国家和民族主义研究。

这部分的要点是，鉴于博物馆的多学科性和多模式性，博物馆研究不可避免地有可能（也有必要）触及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和科学领域的各种方法论和理论争论。因此，博物馆研究也不可避免地要追踪相关学科不断变化的学科辩论和思想潮流。这一点可以从一些近期的思想转变中看出，例如地理学等其他学科中的“非表征理论”、“情感转向”或“空间转向”，这些转变也在博物馆研究文献中发挥了作用。

十一、无法整合的领域

博物馆研究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是另一个重要问题。与其他一些学科相比，博物馆研究仍然



相处于相对初步的阶段，出版物分散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不同学科的出版物中。除核心的博物馆研究期刊，如《博物馆与社会》（*Museum and society*）、《博物馆世界》（*Museum Worlds*）、《国际遗产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策展人》（*Curator*）和《博物馆管理与策展》（*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外，还散见于管理、社会学、考古学、历史、地理、人种学、人类学、科学、艺术史、文学、地理、旅游、建筑、文化研究、媒体研究、记忆研究、物质文化、民间文化、视觉文化、政治、教育、设计史、艺术与健康、文化政策以及最近的信息学和人机交互等领域的期刊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博物馆研究的兼收并蓄是其优势所在，也是必然的结果。一个博物馆可以收藏当代艺术、自然历史和罗马钱币，并利用来自所有这些领域的物品开展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福祉工作（英国近期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因此，博物馆研究人员同样需要借鉴各种学科方法和理论框架。然而，一方面，博物馆研究广泛分布于多种出版物内，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盲点，因为未入门者可能会停留在某一学科分支内，研究成果无法被不同学科的学者群体周知。例如，当下的批判性遗产研究正重复着20世纪90年代及以前的新博物馆学文献中的一些论点，却没有参考这些讨论。另一方面，缺乏如何对博物馆进行批判性研究和持续性思考的方法论文献。

还有，令人沮丧的是，博物馆研究与博物馆实践的脱节。虽然在一些领域二者已富有成效地结合在一起，如艺术和健康领域；但在其他领域，知识渗透的速度却缓慢得令人失望。例如，布迪厄和阿尔·达贝尔（Alain Darbel）的文化资本理论于1969年首次发表，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社会学研究者的文化消费研究，但在艺术策展的辩论和教学中，以及关于观众和非观众动机的行业对话中，这一理论仍然完全缺失。博物馆实践的转变更有可能受到经济驱动因素的影响，例如可用于文化复兴的资金或政府政策措施，如围绕社区凝聚力、健康和福祉以及

吸引游客的举措。

在一些国家，博物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歧体现在术语的使用上。正如我在其他场合与同事讨论过的那样，不同的语言将所谓的“博物馆技术（*museography*）”和“博物馆学（*museology*）”区分开来，前者指的是博物馆应用实践——尤其是博物馆展览和建筑的各个方面——而后者指博物馆理论化^[36]。我在这里使用“博物馆研究”这一概念，而不坚持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这种区别。相反，它的出发点是：我们需要将实践理论化，并将我们的理论付诸实践，以便对两者都进行检验。

值得注意的是，博物馆、画廊和遗产的研究之间也存在区别。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已经开设了一些旗舰性的艺术管理和策展课程，但近年来，画廊研究和当代艺术策展方面的学术研究和课程大幅增加。虽然一些博物馆研究部门已经纳入了这些课程，但这些课程也往往设在所谓的“美术”系，这意味着有关当代策展的文献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同样，直到最近十年，英国的遗产研究的研究生课程学生人数一直比博物馆研究少，尤其是专注于考古学和历史遗迹管理的课程。相比之下，博物馆研究往往更广泛，受到的影响也更广泛，尤其受到了艺术史、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等学科的影响。与遗产研究课程相比，在世界范围内，博物馆研究的研究生课程在数量和范围方面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这种情况可能即将改变。近年来，地理学家对相邻且有时重叠的“批判性遗产研究”领域作出了特别突出的贡献。2010年成立的国际批判遗产研究协会（*Association of 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 ACHS*）以及其宣言和一系列国家委员会已牢固确立了遗产本身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学术领域的地位。国际批判遗产研究协会的双年会现在吸引了800多名学者，这说明人们对该领域有着广泛的兴趣，其中大部分议题包括博物馆研究的内容。其他与博物馆相关的工作也在记忆研究和公共历史领域开展，尽管这些领域之间的交流仍然有限。

十二、博物馆研究的下一步是什么？

可以合理地预测，博物馆研究将继续蓬勃发展，并在其他学术领域得到越来越多认可。展望未来，我们很高兴看到我们对如何从理论和方法上研

究博物馆的理解得到巩固和深化。来自不同文化、政治、哲学和社会背景的博物馆研究者之间进行更多的知识交流和比较研究也将大有裨益。通过反思英语国家和英国博物馆研究迄今为止的发展，我希望能够为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博物馆研究者的交流和该研究领域的未来做出有益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CORSANE G. 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 an introductory reader[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2] MACDONALD S. et al. 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6.
- [3] CARBONELL B M. Museum studies: an anthology of contexts[M]. New York: Wiley-Blackwell, 2012.
- [4] MACDONALD S, HELEN R L, et al.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s of museum studies[M]. New York: Wiley-Blackwell, 2015.
- [5] MASON R.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museum studies. Vols. 1-5[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9a, 2019b, 2019f.
- [6] BENNETT T.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7] ANDERSON G. Reinventing the museum: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the paradigm shift.[M]. Walnut Creek, California: Alta Mira Press, 2004: 10.
- [8] MESSER-DAVIDOW E, SHUMWAY D, SYLVAN D, et al. Knowledges: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ies in disciplinarity[M].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3.
- [9] DENISON E, SHAHID V. Introduction: MoHoA guest editorial[J]. Curator: The Museum Journal, 2024, 67: 7-19.
- [10] SOARES B B, ANDREA W. Editorial: towards decolonization[J]. Museum International, 2022, 74(3-4): iv-xi.
- [11] BONHAM-CARTER C, NICOLA M, eds. Rhetoric, social value and the arts: but how does it work?[M]. Basingstoke: Palgrave, 2017.
- [12] HELD D, MCGREW A.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
- [13] HABERMAS J.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62.
- [14] COOMBES A E. Reinventing Africa: museums, material culture and popular imagination in Late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England[M].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5] MACKENZIE K. Museums and empire: natural history, human cultures and colonial identities[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6] MASON R. The exhibitionary complex[M]//MAIRESSE F, ed. ICOM dictionary of museology. London: Routledge, 2023.
- [17] JANES R R, RICHARD S. Museum activism[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 [18] BENNETT T. Thinking (with) museums: from exhibitionary complex to governmental assemblage[M]//WITCOMB A, MESSAGE K: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s of museum studies. Volume 1: museum theory.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5.
- [19] BARRETT J. Museums and the public sphere[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11.
- [20] ASHLEY S. State authority and the public sphere: ideas on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museum as a Canadian social institution[J]. Museum and Society, 2005, 3(1): 5-17.
- [21] QUINN R M. Distance or intimacy? The arm's length principl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arts council of Great Britain. National arts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policy database[EB/OL]. [2024-03-28]. <https://www.americansforthearts.org/by-program/reports-and-data/legislation-policy/naappd/distance-or-intimacy-the-arms-length-principle-the-british-government-and-the-arts-council-of-great>.
- [22] BARDAK P E. The arm's length principle and its role in The 21st Century arts and cultural sector[J]. Journal of Human and Social Science, 2021, 4(2): 326-339.
- [23] GRAY C. The politics of museums[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 [24] WHITEHEAD C, MASON R, ECKERSLEY S, et al. Place, identity and migration and European museums[M]//WHITEHEAD C, LLOYD K, ECKERSLEY S, et al. Museums, migration and identity in Europe. Aldershot: Ashgate, 2015.
- [25] LABADI S. Museums, immigrants and social justice[M]. London: Routledge, 2017.
- [26] FROMM A, GOLDING V, PER B R. et al. Museums and truth[M]. Cambridge: Newcastle Upon Tyne, 2014.
- [27] BOURDIEU P, DARBEL A. The love of art: European art museums and their public[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69.
- [28] VERGO P. Introduction[M]//VERGO P. The new museology.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89.
- [29] STAM D. The informed mus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Museology’s for museum practice”[J].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1993, 12(1): 267–283.
- [30] MACDONALD S. Behind the scenes at the science museum[M].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2002.
- [31] CROOKE E. Politics, archaeology and the creation of a national museum in Ireland: an expression of national life[M]. Dublin: Irish Academic Press, 2000.
- [32] MASON R. Museums, nations, identities: Wales and its national museums[M].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7.
- [33] SAVAGE M, GAYNOR B, BRIAN L. Globalisation and belonging[M]. London: Sage, 2005.
- [34] LATOUR B.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M]. Cambridge, Mass. US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35] ALBERTI S. Objects and the museum [J]. Isis, 2005, 96(4): 559–571.
- [36] MASON R, ROBINSON A, EMMA C. Museum and gallery studies: the basics[M]. London: Routledge, 2018.

征 订 启 事

《博物院》杂志是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科学出版社）主办和出版，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和河北博物院共同协办的国家级博物馆行业学术期刊。本刊主要栏目有专题探索、理论研究、博物馆实践，涵盖与博物馆相关的以下学术研究成果：博物馆学理论与博物馆史，藏品征集与保管，藏品修复与保护，藏品研究，展览与展评，博物馆教育、宣传与文创，博物馆管理、开放与安保，博物馆建筑，博物馆数字化与信息化，与博物馆相关的历史与考古研究、古建筑和古遗址的保护与研究等。

2024年定价：58元/期；全年刊期：6期；全年定价：348元。国际标准大16开本，136面，全彩印刷，面向国内外发行。

订阅方式：

1. 邮局订阅，邮发代码80-603。
2. 科学出版社期刊发行部，联系电话：010-64017032，010-64017539。
3. 淘宝店铺、微店店铺名称：中科期刊（订阅或购买过刊均可）。
4. 扫描下方二维码：



5. 直接办理银行汇款，指定汇款信息如下：

收款单位：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首体支行

银行账号：0113014170012168